

论《海岛逸志》的史学价值*

郑 镛¹, 连心豪²

(1. 漳州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 福建 漳州 363000; 2.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王大海为漳州府龙溪县人,乾隆五十六年撰成《海岛逸志》六卷。该书作者在清代闭关锁国之际,居于海外看世界,录其见闻为书,对国人了解海外情势有不可估量的史学价值。《海岛逸志》介绍了印尼诸岛的航路、风土人情,以及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一带的风俗、政教等情形,还为华侨立传,颂扬了华侨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贡献。作为一部华侨亲自撰写的海外见闻录,该书反映了18世纪末南洋荷属殖民地的社会状况,揭露西方列强在东南亚的扩张,叙述当时华侨、华人的生活状况,使国人开一眼界,亦是研究南洋、研究海洋文化之典籍。但对这一珍贵的海交专著,国内较少专门研究。

关键词:王大海;《海岛逸志》;文化传播;史学价值;海交研究

中图分类号:K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1-0075-07

王大海,字碧卿,号柳谷,乾嘉间龙溪县人。幼读诗书,因应试不第,且“为文词耻就有司绳尺,遂弃举子业,以著作自娱”。^[1]为了生计,亦做些生意,但经营不善,“其货且多逋负”,^[2]决意罢手,“慨然尽倾田产以畀人”,^[3]乾隆四十八年(1783)“附贾舶登吧岛”。^[4]至爪哇,后居三宝瓏,赘于华人甲必丹家,衣食丽都,侍婢数十。乾隆五十七年(1792),终以家有老母,拂袖而归,依然舌耕度日。王大海侨居南洋期间,留心彼地山川风土人情,四处访求,入耳会心,以笔为舌,撰成《海岛逸志》六卷,另有《洪馀诗钞》若干卷。其姑夫刘希程于嘉庆七年(1802)五月间见阅二著并为《海岛逸志》作序云:“王君碧卿,余内人侄也。孝于亲,笃于友。少习举子业,工诗词。癸卯之年,曾为甘旨之谋而航海者。舌耕之暇,采风问俗,举诸番之胜概异状,一一志之。十载归来,而歌咏之章与海岛诸志各裒然成集矣。”^[5]而据王大海《海岛逸志》卷首之“自序”所署年月,则可知《海岛逸志》成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嘉庆十一年(1806)首刊于漳州(称“漳本”)。以后陆续有各种丛书本和英译本刊行(见表1)。

* 收稿日期:2008-11-05

作者简介:郑镛,男,福建漳州人,漳州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副教授;连心豪,男,福建仙游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表1 王大海《海岛逸志》诸家版本一览表

书名	卷数	版本名称	简称	出版者	出版时间	备注
海岛逸志	6	漳园藏板(漳园刊巾箱本)	漳本	王廷珊梓	嘉庆十一年(丙寅,1806)	乾隆五十六年完稿并序。有自序、他序(四篇)、地图,附刻黄毅轩《吕宋纪略》。北京图书馆藏,书号:地 939/854
海岛逸志摘略	1	《域外丛书》(静观斋刊本)	域本	王蕴香辑	道光二十二年(1842)	标王大海撰,无序
爪亚风土拾遗	1					不标撰者名,无序
三宝垅	1					
海岛逸志	1	《舟车所至》(琴川郑氏青玉山房刊本)	舟本	郑光祖辑	道光二十三年(1843)	标王大海撰、郑光祖评,无序
海岛逸志摘略	1	《海外番夷录》(有京都漱六轩藏本)	海本	该书即《域外丛书》,仅书名不同	道光二十四年(1844)	有王鏊序(王蕴香即其侄)
爪亚风土拾遗	1					
三宝垅	1					
A Desultory Account of the Malayan Archipelago	6	英文译本	英本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译	道光二十九年(1849)	据嘉庆漳园本译,除自序、他序外,有译者在上海所作序
海岛逸志	1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上海著易堂排印本)	斋本	王锡祺辑	光绪十七年(1891)	标王大海撰,无序

香港学津书店 1992 年 10 月出版由姚楠、吴琅璇校注的《海岛逸志》,乃以“漳本”为祖本,细加校勘、注释。但内地至今尚未见新印本,亦较少对这一海交专著进行专门研究,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对王大海《海岛逸志》略作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海岛逸志》的撰写背景

清初,由于郑成功海上抗清力量的活动,清朝实行了“海禁”政策,对外交通、贸易基本停顿。清朝统一台湾以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东南沿海“海氛廓清”、“海内一统,寰宇宁谧”,为求“以障庶富之治”,清政府取消“申严海禁令”。旋即于同年八月差户部郎中宜尔格图、吴什把往粤闽两省开关抽税,^[6]翌年三月再遣户部郎中舒书赴江浙两省开关抽分海税,^[7]分别命名粤、闽、江、浙海关,史称四樵关。粤闽两省素有对外通商贸易的传统,粤之广州港,闽之泉州刺桐港、漳州月港均为知名度较高的国际性大港,边民一向“以海为田”,以海洋贸易为生,“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税有余,小民小获安养。”^[8]闽海关设置后,英国商船“快乐”号来厦门贸易,厦门商船也航行到暹罗、宿务、苏禄、安南、吕宋诸国进行贸易,厦门港一度出现“番船辏集”、“市井繁华”的盛况。清初开海禁更多地是从政治、军事利益考量,但清廷又一直担忧汉人“聚众海上”闹事或居留外洋蕴蓄反清力量,因而多次改变对外贸易政策。康熙五十六年(1717)实施南洋禁海令,切断南洋各地与我国的传统贸易,外贸的主要对象转向西方各国。由一些受国家特许的大商人组成公行,垄断对外贸易。

当时,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专制主义政权把对外贸易看成播威异域、示恩于“外夷”的行为,妄自尊大地认为“天朝无所不有”。从乾隆年间起,由于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非法活

动增多,清政府的对外政策越收越紧,加上18世纪以后国内社会危机渐渐出现,清王朝由盛转衰,更加惧怕外来势力和沿海民众接触会加剧不稳定因素,因此越来越走向闭关自守。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下令关闭闽、浙海关,只限广州一口通商,同时对进出口货物实行极为繁琐的限制,凡粮食、铁器、生丝、马匹等等,均在禁止输出之列。闽海关关闭后,厦门口岸只准与吕宋贸易。但此举收效不大,许多商人通过贿赂本地官员,千方百计地冲破海禁,到南洋各地进行走私贸易。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同意厦门与南洋各地进行贸易,“外夷商船到闽海关,其货物照粤海关则例征收”。至乾嘉之际,这里还是“洋船丛集,商贾殷阗,仙山楼阁,甲于南天”。^[9]

清代闭关锁国的结果是使当时的朝野人士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特别是对西方殖民势力已侵入东南亚的事实认识不够,对西方各国的典章制度更是一无所知。

17-18世纪,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主要国家的资产阶级先后取得了统治,海外殖民事业从而获得更为强有力的推动。“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10]

17世纪初荷兰人已经先后在东南亚建立了几个据点,控制了南洋群岛的香料资源,并在日本设置了商馆。荷兰人认为,如果能把欧洲、印度、东南亚的货物卖到中国,从中国贩运丝绸、瓷器到日本,在日本得到白银,用以支付他们在东南亚购买的香料费用。这样荷兰人不用从欧洲携带资本,仅靠东方贸易的收入就能维持他们在东方的殖民活动。1601年荷兰人航达澳门探测航道,为澳门的葡萄牙人所俘获。为独占对外贸易,他们竟处死这些荷兰水手。荷兰人为报复,于次年切断满刺加航道。截夺从澳门驶往果阿的葡萄牙船队,又在澳门近海拦劫葡萄牙人驶往日本的商船。十年之内,远东的制海权便落入荷兰人手中。与荷兰人一起在远东与葡萄牙人争斗的还有英国人。欧洲列强在远东的争斗,是当时世界范围内殖民强国争夺海外殖民地的贸易权争斗的一部分。1619年荷兰占领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改其名为巴达维亚。自1596年6月荷兰的霍特曼船队踏上爪哇西部的万丹,至19世纪头20年,荷兰实现了对爪哇全境的统治,继而在20世纪初完成对爪哇以外的岛屿的管辖。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度尼西亚200年,1800年,公司宣告结束后,由荷兰政府直接统治。

王大海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清政府重新开放海禁的第二年由“厦岛扬帆”赴印尼,正值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印尼的鼎盛期,其见闻录为笔记,对国人了解海外情势当有重大价值。

二、《海岛逸志》的主要内容

《海岛逸志》分为六卷,卷一“西洋纪略”,卷二“人物考略”,卷三“诸岛考略”,卷四“山海拾遗”,卷五“闻见录”,卷六“花果录”。

卷一,王大海重点介绍了印尼诸岛的航路以及风土人情。其一对“噶喇吧”描述尤详:其地距中国“约一万四千里”,“门户坚固,城池严峻,地里雄阔,街衢方广,货物充盈,百夷聚集之区,诚一大都会也”,^[11]为东西方货物集散之地,“货物悉皆各处属国辐辏以赴贸易者,并非吧所产地”。^[12]自明代起,我国闽广百姓即到彼经商,“留寓”为华侨者“奚至十万之众”。1662年荷兰殖民者被郑成功驱逐出台湾后,尽力经营吧城。书中描写了荷兰人的习俗。吧城的土著和华人的生活状况也在书中有所反映。其二介绍了三宝瓏的人文地理。三宝瓏为王大海入赘华人甲必丹之地,故记载

噶喇吧,城名,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古名巽他加拉巴,1527年为淡目国所占,改称雅加达。1619年荷兰占领其地,改名为巴达维亚。1949年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复名雅加达。华侨称其城为吧城,称爪哇岛及附近岛屿为吧地、吧国。下文地名按此。

详实。18世纪以来,华人在此居住贸易者甚多,甲必丹之“权分”大于吧城,“膺其职者则富逾百万”。^[13]其三为“北膠浪”(中爪哇省之一府)之地理形势,尤可注意的是王大海记载了北膠浪为华人航海保护神郭六官的“泽海真人祠”。四为万丹情势。五为“爪亚风土拾遗”,从人文角度记载爪哇诸岛的情况,尤可贵的是载录了18世纪印尼的母系社会遗风——“重女轻男”的婚俗,“生女为贵赘人于室”。^[14]其七为“噶留吧后记”,反映荷兰殖民者窃占爪哇史实以及贩卖鸦片的罪行,还记载荷兰殖民者对华商的种种刁难。这一节应是“漳本”所无,因文中记载了1811年英国与荷兰在印尼的争斗和英国殖民者短暂统治印尼的史实,故可断为“漳本”刊行20年之补记或他人补撰。

《海岛逸志》卷二共列了九个人物传略。依次为“王三保”、“泽海真人”、“苏某之妻”、“连捷公之妻”、“连木生”、“陈豹卿”、“许芳良”、“黄井公”、“僧佛宾”。其中王三保——王景弘的记载颇异于同时期的海交史籍,其在爪哇三宝瓏的影响比郑和为大。“泽海真人”原名为郭六官,“帆海经商”当地人欲劫货物,六官“赴海而行,瞬息不见”。后“华人以为神,私谥为泽海真人,立祠以祀焉”。^[15]“苏某之妻”与“连捷公之妻”则以中国传统文化中之妇女孝烈标准为当地妇女嫁华人者立传。“连木生”为华人知识分子在印尼雅加达造中国式园林致“宾客满座”,为中国园林文化传播至东南亚提供一案例。^[16]“陈豹卿”为三宝瓏之甲必丹,经商有方,在当地极有地位、威望,且妥善安排投奔他的华人、华商,促进当地经贸繁荣。“许芳良”是为吧城华人首领雷珍兰,气量过人,善待落魄华人及婢仆,传为美谈。“黄井公”曾为三宝瓏之甲必丹,生活朴素,为人仗义。“僧佛宾”为三宝瓏观音亭之主持,入乡随俗,竟学洋教之牧师,“公然娶妻,育子女各一”,^[17]反映中土佛教传至东南亚之变异。

卷三“诸岛考略”。记载了“和兰”(荷兰)、“红毛”(英国)、“和兰西”(法国)、“爪亚”、“息尘”、“无来由”、“武吃氏”、“武敦”、“暴暴”、“西兰”、“吉宁”等22个国家和地区(岛屿)的地理以及风土人情。23条为“吧国地舆”描写巴达维亚的周边诸岛和地理形势。24条为“西北诸岛考略”对印尼西北面的好望角、斯里兰卡等做了简要介绍。其反映18世纪后半叶西洋列强在南洋争夺、经营殖民地情形以及南洋诸国(诸岛)土著、华人华侨生活状况,是研究华侨史弥足珍贵的史料。

卷四为“山海拾遗”,共有33条。记载描述印尼诸岛的气候、季节,独特的自然现象,物种、物产、矿产以及土著习俗等。因是王大海“眼见为实”,行文活灵活现,相当生动有趣。

卷五“闻见录”共有28条。介绍荷兰和西洋诸国所产的物品如地平仪、气压表、自鸣钟、热气球、汽枪、望远镜、铁甲船、铜炮等,也介绍了印尼当地土著创造的“竹筏”、“藤桥”和打猎用的毒液等,还有荷兰人的书写习惯、医学医术。难能可贵的是王大海对西方近代的科技产品不是如传统的中国士人斥之为“淫技巧作”,而是流露出羡慕向往之情。此外还记载了闽南民间南拳太祖、达尊、猴拳、鹤拳传至南洋的印尼、马来西亚,当地土著“武吃氏”(布吉斯人)热心学习之情形。

卷六为“花果录”,共22条,记载印尼一带所产之花卉和水果。其中“红毛丹”、“喃喃”、“丝丝啮”、“望吃”、“流连”等为中土所无,而对芒果、蕉、柑、葡萄、枇杷、圆眼、羊桃、黄梨、西瓜之类中国也有的水果,王大海做了比较,认为“味皆美于闽广”,并没有狂妄自尊之语,只是实话实说。

三、《海岛逸志》的价值评估

在王大海远赴南洋之前,已有漳州人程日焯居吧城七年后归来撰写《噶喇吧纪略》一卷行世。程日焯,字逊我,漳州府漳浦县生员。据光绪《漳浦县志》卷十六“人物志”(下)所载:“少丧父母,以家贫多债负,流徙外国,杂佣作度日。偶题对于丛祠,外国富人见而异之,延至其家,将赘以女,日焯辞焉,富人怒而逐之,仍故业。居数年,拮据积累,遂归。”乾隆五年(1740)冬,至京城,应翰林院编修,同乡蔡新之请撰《噶喇吧纪略》,归家后,以“中间不无遗漏”为憾,“复作拾遗数则,附焉”。《噶喇吧纪略》约于乾隆十三年(1748)刊刻,字数寥寥、不足万言,但还是简介了爪哇岛及周边地理情势,

漳、泉、湖、广等地海商前往贸易情状以及当地人文、物产等。漳浦籍学者蔡新阅后大为赞赏，“谓其足以裨志乘，资博闻”。^[18]时隔43年，王大海深感程逊我《噶喇吧纪略》之不足，特别为中华文化远播重洋而谓叹，方提笔撰写《海岛逸志》。“余读程君曰焮《噶喇吧纪略》，志其方土颇详，而人情未尽也”；“西洋荒服之国，竟化为邹鲁之乡者，皆被朝德泽，虽遐陬僻壤，莫不感化。海不敏，敢不仅录所见所闻，及其方土人情，与夫一言一行之可传者，悉表而出之，以为正人心，扶世道之子补乎”。^[19]事实上，王大海的《海岛逸志》之历史文献价值已大大超出他的初衷。可归纳为以下五点：

1. 是一部由华侨亲自撰写的海外见闻录。

唐代以来有关海交史籍，特别是关于东南亚的史籍，比较著名的有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代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黄衷的《海语》、张燮的《东西洋考》以及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王大海的《海岛逸志》和谢清高的《海录》等。这些专著中有一部分是根据辗转传闻，笔录成书；一部分虽是亲身经历但只是随使出访，短时逗留，走马观花，道听途说，浮光掠影，未可全信。就南洋情势，特别是印尼情势而言，唯有王大海旅居爪哇十年之久，入赘甲必丹之家，交游广泛，采摭博宽，其记述的全面性、系统性与真实性当较他书更胜一筹。我国著名的南洋史、华侨史专家姚楠教授指出：《海岛逸志》是“由海外华侨亲自撰写的一部见闻录，其或可以说是华人详细叙述当地山川、形势、物产、名胜、风土、人情以及华侨生活、俗尚的第一部著作”。^[20]

2. 详细反映18世纪后半叶荷属爪哇殖民地的社会状况，揭露荷兰、英国等列强在东南亚的殖民扩张。

据明代万历年间漳人张燮《东西洋考》的记载，当时国人对荷兰尚知之甚少。“红毛番自称荷兰国，与佛郎机邻壤，自古不通中华。其人深目长鼻，毛发皆赤，故呼红毛番云。一名米粟果。佛郎机据吕宋而市香山，荷兰心慕之，因驾巨舰横行爪哇、大泥之间，筑土库，为屯聚处所。竟以中国险远，垂涎近地。尝抵吕宋，吕宋拒不纳，又之香山，为澳夷所阻，归而狼卜累年矣。”^[21]可见当时国人对其船坚炮利、觊觎澳门有所警戒。

《海岛逸志》卷一叙述了荷兰在爪哇的殖民统治。“和兰设计笼络、纳其租税，施行号令，设立法度，盘距海边之地，征课税、给文凭，填出入，严盗匪，管束诸夷。”和兰风俗，未免掩耳盗铃之弊……上贼其下，肆行贪酷……”爪亚之人数倍于和兰。其俗尚质实，人愚蠢，性柔怯，畏惧和兰。’乾嘉年间，荷兰殖民统治者对前往爪哇的华商也百般刁难，“我华人远贩于此，向来皆就所售货银，或置货，或将银带回，各从其便。今则严禁，不许寄银出口，必令将转置货物，方许扬帆。而其货物又皆产于他处，未到吧地，以致唐船守候日久，风汛过时，年年不能抵厦，甚至遭及夏秋风颶，人船俱没。”

而“英黎红毛番”（英国人）“久伺其利，欲图之已久，及嘉庆十四年秋，遂兴甲板舟数十往攻……今之吧地，悉属红毛统辖。”这段补记史料所述即1809年起，英荷两国为争夺香料贸易，掠取殖民地，一直争斗不休，至1811年英军12000人攻占吧城，荷兰人在三宝瓏签订投降条约。经英国人短暂的殖民统治后，1816年荷兰收回对爪哇等地的殖民统治权。

3. 最早为华侨立人物专传，反映华侨生活状况。

《海岛逸志》卷二为6个华侨立传，虽然作者认为“人物考尚欠采取”，但的确弥足珍贵。他们或为华侨首领甲必丹、雷珍兰，或为佛教寺庙主持，均以故乡为念，并在海外弘扬中华优良的民族美德，受到华侨的拥戴，得到当地土著甚至殖民者的尊重。

当地的华侨中下层“在吧有受其（指荷兰人）僱雇为舟人者”。三宝瓏为华商麇集之地，“经商者不知其数”。华侨在三宝瓏颇为团结，甲必丹黄井曾被荷兰殖民者借故拘押，“众所仰其义，愿为之地各敛金而出之”，当地华侨筹款营救出狱。

《海岛逸志》所散载18世纪末的史实可以佐证，弥补华侨史之缺遗。1740年10月9日，荷兰殖

民统治者悍然对巴城无辜华侨进行血腥大屠杀,城内华侨遇难者近万人,被洗劫、焚毁的华侨房屋6700家,史称“红溪惨案”。该事件使吧城几成死城,人口骤减,劳动力奇缺,商业萧条。后来荷尼当局只好采取又招徕又限制的政策,华侨陆续回迁,至18世纪70年代,华侨人口两倍于惨案之前。除巴达维亚外,华侨在万丹人数不足200人,安汶岛的华侨至1795年也仅有429人。^[22]在苏门答腊,因荷兰人无力顾及,中国商人仍然继续在亚齐等地进行贸易活动。17世纪80年代每年6月左右,都有10-12艘中国商船,满载大米等中国商品以及木匠、油漆匠、装修匠等移民到亚齐,“他们都住在城市尽头的海边叫做华人区的地方”。^[23]在巨港,“也有早期的华人移植地”。^[24]后来,“由于苏丹不准华侨依靠土地为生,因而被迫住在船上或木筏上恃河为生”。^[25]

在西里伯、噶厘和帝汶一带的小巽他群岛以及新几内亚沿岸的各小岛地区,也有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但不见定居于此的记载。可能因为这一地区是海盗出没的场所,也可能因为这一地区的经济环境并不引起中国人的兴趣。

在西加里曼丹,中国人因通商贸易而有移入的,但大批移居西加里曼丹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西加里曼丹富有金矿,当地苏丹在18世纪40年代招徕华工开采成功,消息传出,中国人(主要是客家人)纷纷移入西加里曼丹。从18世纪60年代起,大约每年有3000人移入西加里曼丹,大多集中在三发、喃巴哇和坤甸等近海地区,后来也有逐渐往内地扩展的。华侨主要是从事开矿业。1812年前后,主要金矿地三发有中国移民30000人,并组织了开矿的机构“公司”。由中国人开采的金矿有30多个,每矿有工人300人,矿地是向当地苏丹租的,每矿每年交50两黄金的租金,中国人每人交人头税3元。^[26]对于西加里曼丹兴旺的金矿业,荷兰殖民者十分垂涎,于1816年从三发苏丹那里取得购买矿地的权力,并派出远征队到西加里曼丹。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王大海记载了华侨对明初出西洋正使之一的王景弘的崇拜。《海岛逸志》卷二“王三保”条云:“明宣宗好宝玩,固命王三保、郑和等至西洋采买宝物,止于万丹……而三保洞有三保洞,俗云三保遗迹,极有灵应。”据考王景弘(王三保)为明代漳州人。明万历元年(1573)《漳州府志》卷三十一“宁洋县”之“武勋”条载:“王景弘,集贤里香寮人。从太宗北征,后有拥立功,授其子宁南京锦衣卫正千户。”宁洋县为隆庆元年(1567)“分割龙岩县集贤里五图、延平府大田、永安县各三图”而置,隶漳州府,今则部分归漳平县,隶龙岩市。^[27]18世纪末,在南洋华侨中尚流传种种有关王三保的传说,并在每月朔望前往三保洞崇祀三保大人像。这一三保大人信仰后又由归国华侨回传到闽南,今龙海角美鸿渐村就有三保庙,奉祀王、郑二位三保大人神像。

4. 描述中华文化传播海外情形。

郑和船队到达东南亚之后,中华文明为海外诸邦所仰慕,掀起了又一波中国文化热。乾隆年间,东南亚的华侨潜意识地将闽南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移植到侨居地,并使其中一部分在当地发扬光大。《海岛逸志》中所描述的南拳、园林营造术、南曲在印尼的传播情形为我们提供了可靠史料。

《海岛逸志》卷三之“武吃氏”条云“武吃氏,居于望加锡(今印尼苏拉威西岛西南端,为南苏拉威西省省会)。……其族性强悍,刚猛异常,视死如归……南洋诸国皆习武艺,武吃氏最勇……不论男女,十岁以上,则习枪棒、跳舞诸技,其枪法刀法皆有教师秘传,其教之名色甚多,如太祖、达尊、猴拳、鹤势之类,故其为南洋之冠。”太祖、达尊等拳种是广泛流传于闽南的南少林拳,据传太祖拳创立于北宋,植根于漳泉,其棍法天下独步。“教师秘传”之语或可谓闽南武师前去南洋传授武技,称雄一方。

《海岛逸志》卷一之附记《蛰园雅集记》记载了乾隆五十六年漳浦籍华侨黄先生在印尼巽他海峡之北、井里汶之西建造具中国江南特色的园林寓所——蛰园,“园中绿树扶疏,回廊掩映,清流一曲,斜抱长堤,远黛峨眉,当门挹翠”,巧借海景以造园,当为南洋首创,中土亦为罕见,极传中华园林艺术之精妙。

《海岛逸志》卷五“赌棚”条则反映清代闽南南音传至南洋的情况。因赌棚“日日演戏”，华人领袖“甲必丹及富人蓄买番婢，聘漳、泉乐工教之，以作钱树子，有官音乱弹、泉腔下南二部，其服色乐器悉内地运至耳”。南音在东南亚华侨社会仍葆有活力，与当年乐工南下教习当大有干系。

5. 较早明确指出鸦片危害，提醒国人免受其害。

《海岛逸志》卷一“噶留吧后记”，虽是书成后 20 余年再补入，但史料价值颇高。特别是揭露荷兰殖民者以鸦片毒害当地土著的史实，“又设阿片黑烟以诳诱之，使其众必服食此物为快，暗令自致瘦弱至于绝灭，且使无志兴复土地，不生报怨之心。”我中华之人亦受其朦，一服此物，遂忘故乡之苦，不以父母妻子为念，遗害不可胜言。”和兰却自禁其众不得窃服，犯者立至重刑。《海岛逸志》的记载反映一个史实，即利用鸦片进行不道德的贸易并非英国殖民者的专利，荷兰殖民者对此也是驾轻就熟，且为始作俑者。

当然，王大海由于时代的限制和学识的盲区，著作中也有讹误之处，甚至牵强附会，如地理名称、方位概念不明晰，对热气球等原理不明，胡乱描述，贻笑识者。19 世纪中叶英国汉学家、《海岛逸志》的英文版译者麦都思在英译本序言中指出，“本书作者与其大多数同胞一样，是一位富有学问和观察力的人。他的某些曲解和偶然的错误乃是由于他的早年习惯和资料的片面性。但是考虑到他写作时的环境，他的说法还是表露了不少善意和好感。书中对于欧洲人的习俗，所作奇特的叙述，也许会使西方读者感到有趣，可以说明中国人对外国的想法。书中所附的当地地图是一件文学珍品，并显示出中国人在水文测量技术方面落后于欧洲人多远，虽然有时候他们可能对风土人情做出一些聪明的评论。”^[28]麦都思语气中的欧洲中心观当然不可取，但他能认识到《海岛逸志》中关于“风土人情”的描述和评论的价值，也是有相当的眼力。《海岛逸志》虽有不少瑕疵，毕竟还是为后人留下珍贵的 18 世纪末南洋史料，特别是华侨、华人的的人文信息。可以说，王大海的《海岛逸志》当为国人开一眼界之佳作，海洋文化典籍之珍品。

注释：

- [1][2][3][4]《海岛逸志》李威“序”，香港：学津书店，1992 年，第 1 页。
[5][19] 王大海：《海岛逸志》著者自序，香港：学津书店，1992 年，第 1 页。
[6]《明清史料》丁编第八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745 页。
[7][8]《康熙起居注》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311 页。
[9]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二十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231 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254 页。
[11][12][13][14]《海岛逸志》卷一，香港：学津书店，1992 年，第 2、20、23、30 页。
[15][16][17]《海岛逸志》卷二，香港：学津书店，1992 年，第 41、42、49 页。
[18]《海岛逸志》刘希程“序”，香港：学津书店，1992 年。
[20]《海岛逸志》校注者“序”，香港：学津书店，1992 年。
[21] 张燮：《东西洋考》，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 89 页。
[22] 岩生成一：《论安汶岛初期的华人街》，转引自《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63 年第 1 期。
[23][24][25][26] 布赛尔：《东南亚的中国人》，转引自《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 年第 2、3 合期。
[27] 陈自强：《郑和下西洋与漳州》，《泉漳集》，香港：国际华文出版社，2004 年，第 212 - 213 页。
[28]《海岛逸志》英译本序言，香港：学津书店，1992 年。

[责任编辑：陈双燕]

(英文摘要下转第 105 页)

注释:

- [1] D. Nelson, "Constructible falsity",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1949(14) 16-26.
[2] 潘世墨:《逻辑的“否定”概念简析》,《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
[3] David Pearce, "From here to there Stable negation in logic programming", Gabby, Wansing, *What is negation?*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9, 161-181.
[4] Graham Priest, *An Introduction to Non Classical Logic*,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6][7] 李小五著:《模态逻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

A Modal System for Strong Negation and its Properties

LI Xiao-wu¹, LIU Jia-qiu², XU Qiu-hua¹

(1. Institute of Logic and Cogni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2.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Negation is one of the central concepts of logic. Intuitionists have characterized a strong negation by relation semantics, and in this study we also characterize a strong negation by relation semantics. There is however a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negations, i. e., our negation is the complement of the intuitionistic negation, so the semantic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ystem for our strong negation have some properties which the semantics and the corresponding system for intuitionistic negation do not have, such as irreflexivity, which is modally definable with respect to the semantics we give.

Key words: negation, strong negation, relation semantics, irreflexivity

(上接第 81 页)

A Probe into Anecdotes on the Sea Island

ZHENG Yong¹, LIAN Xin-hao²

(1.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 Z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Zhangzhou, 363000 Fujian;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Wang Dahai, born in Longxi County, Zhangzhou Prefecture, lived between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Emperor Jiaqing of the Qing Dynasty. On the forty-eighth year of Qianlong, he went to Java and became the son-in-law of the head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organization. Ten years later, he came back to China and wrote six-volume *Anecdotes on the Sea Island* and some poems. The book was finished at the time when the Qing government closed the countr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As the author observed the world in a foreign country and wrote down what he saw and heard, the book is invaluable for the Chinese to know about the overseas conditions. It also covered the customs, politics, and the religion of Dutch colonists in Bataafse. It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that opens Chinese eyes as well as a precious gem on ocean culture.

Key words: Wang Dahai, *Anecdotes on the Sea Isl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historic material value; research on ocean communication